

世界观与 国际关系理论

曾向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国别与地区培育基地”建设资金资助

世界观与 国际关系理论

曾向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理论/曾向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6999 - 5

I. ①世… II. ①曾…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关系—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 IV. ①B0 - 0②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245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雅慧
责任校对 黎玲玲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503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和谐世界观的三重使命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
第二节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评估	(24)
第三节 章节安排	(38)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与“世界观问题”及其研究	(44)
第一节 世界观的定义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47)
第二节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世界观问题”的研究	(57)
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者贝尔对“世界观问题”的研究	(75)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研究	(88)
第五节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估	(96)
第二章 霸权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106)
第一节 世界观概念的流变及其功能	(108)
第二节 世界观及“世界观问题”的六个维度	(125)
第三节 霸权世界观的预设——以郝大维和安乐哲的 研究为例	(131)
第三章 霸权世界观预设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中的体现	(159)
第一节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恐惧症”	(161)
第二节 结构现实主义的世界秩序方案及其伦理内涵	(166)
第三节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世界秩序方案及其伦理内涵	(176)
第四节 建构主义的世界秩序方案及其伦理内涵	(185)

第五节 现代西方世界观建立“同一性帝国”的冲动	(215)
第四章 权力与世界观:霸权世界观的政治后果	(235)
第一节 国际关系中权力概念的重构	(237)
第二节 象征性权力与霸权世界观	(258)
第三节 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	(293)
第五章 和谐世界观的学理化尝试	(329)
第一节 和谐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331)
第二节 和谐世界观的部分启示	(347)
第三节 和谐世界观的思想根源、可期性与合理性	(370)
结论 和谐世界观需要自我肯定	(403)
第一节 本书的基本观点	(405)
第二节 本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412)
第三节 本书有待拓展的研究方向	(428)
参考文献	(436)
后记	(470)

导 论

和谐世界观的三重使命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98页。

不是说价值中立的学术才是纯学术，历史上哪有过什么价值中立或纯学术？分析所谓价值中立的学术，就是要分析它怎么来的，基于怎么样一种特殊的生活世界。对这套有特定的、相对隐蔽的价值取向的学术和叙事，我们要有能力看到他们所属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历史性关系，我们才有研究、分析和批判这种学术和叙事的可能性。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
历史批判》，第246页。

（在进行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时）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史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

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在研究的性质上，也未能与众不同。在世界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界，只落得是多我们不为多，少我们不为少。

——杨国枢、文崇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转引自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第6页。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2005年9月15日庆祝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特有的和谐世界观。在讲话中，胡锦涛主席认为，和谐世界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政治与安全层面上：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经济层面上：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文化层面上：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对待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上：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为了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胡锦涛还就中国在建立和谐世界的过程中正在或将要坚持的对外政策的立场、对外互动的原则、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以及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等问题，作了简要的阐述。^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在报告中重申了中国要致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决心。^② 与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相比，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了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各领域中的具体要求和规范内涵，细化了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安全领域的基本原则，同时增加了在生态领域的相关主张。除了以上这两个重要场合（一个是世界各国领导人聚会的联合国，面对的是全世界人民；一个是在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党代会上，面对的是全国人民），此后，中国领导人在其他各种场合不断阐释“和谐世界”的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不仅如此，在和谐世界概念的基础

^①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② 胡锦涛在十七大党代会上关于对外政策部分的报告，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http://www.xinhuanet.com/zhibo/20071015/wz.htm>。

上,国家领导人和学术界还提出了“和谐地区”“和谐亚洲”“和谐周边”等概念。^①这些新概念,连同中国领导集体在国内倡导的“和谐社会”构想,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具有家族相似性(维特根斯坦语)的“和谐”话语体系,也成为用以指导中国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重要指导思想。

“和谐”话语体系结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传统思想有关和谐与斗争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包括丰富的和谐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不能把达尔文学说中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等用以说明自然界物体相互作用的逻辑,简单地套用到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中,因为“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②而“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复杂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即使“自然界中死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③如果说自然界不能理解为纯粹“为生存而斗争”而展开的领域,那么将复杂和有意识的人类活动领域理解为“生存斗争”的场所更

① 关于“和谐周边”的提法和研究可参考许涛《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和谐地区》,载《瞭望》2006年第25期;陆钢:《“和谐地区”与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杨丹志:《构建和谐地区对于和谐世界构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1期;丛向群、尹吉成:《营造和谐周边 构建和谐世界》,载《当代世界》2007年第9期;何平、李云霞:《发展中印关系 构建和谐周边》,载《学术论坛》2009年第3期等。关于“和谐亚洲”的提法和研究,见翟崑《在“和谐亚洲”的大目标下》,载《瞭望》2006年第26期;杜幼康:《构建“和谐亚洲”:时代需要与面临挑战》,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期,等等。关于“和谐地区”的提法和研究,见俞新天等《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08页;李立凡:《构建和谐地区,共谋上海精神——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与其他地区组织的共同发展与合作展望》与刘锦前:《构建和谐地区的理论探讨——评〈21世纪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综合研究〉》,均载刘杰主编《中国发展的国际效应》,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②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162页。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2页。

是大谬不然。正是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冲突与和谐、斗争与合作的这种辩证观点,我们能够将上述和谐话语体系视为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思想传统中有关和谐与斗争丰富思想资源的崭新理论成果。而就和谐世界观而言,它的提出更是对马克思理论国际问题思想中国化和中国外交实践理论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在国际关系领域,虽然是以国家冲突和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但国家之间同样不乏合作与和谐的现象。二战结束以来,虽然在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国家集团之间发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但在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热战,已经说明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和谐是可能的。这在冷战结束以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胡锦涛主席指出的:“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①“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②这就要求世界各国人民摒弃分歧,搁置争议,避免冲突,共同为实现和谐而做出贡献,因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③

和谐世界观的提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明确将和谐世界观视为一种“世界观”,是因为它具有一般世界观的两个界定性特征:首先,它具备自身独特的世界秩序方案,其次,它是从整体的角度理解世界的。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和谐世界观,是中国领导集体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进行判断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世界观类型。实际上,在国内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从世界观的角度讨论了“和谐世界观”提出的意义。^④本

①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② 胡锦涛:《促进中东和平,建设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6年4月24日。

③ 同上。

④ 将“和谐世界”理解为世界观的研究成果有很多。据作者的阅读范围所及,期刊论文有,殷有敢:《中国传统伦理视域中的和谐世界观》,载《南方论坛》2005年第12期;王义桅:《和谐世界观改变国际政治视角》,载《决策探索》2006年第1期;宋效峰:《简论中国对地区多边机制的参与——以和谐世界观的视角》,载《理论月刊》2006年第5期;宋效峰:《和谐世界观与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联系》,载《中共南宁市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李宝俊:《“和谐世界观”与“霸权稳定论”——一项比较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6期;巴殿君:《新形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和谐世界观”的构建》,载《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张殿军:《和

书认为,“和谐世界观”表达了中国对世界政治未来的一种展望,它代表着中国对国际社会发展方向所作的判断,有助于让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国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诚意,而且意味着社会经济与军事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提出了自身对全球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也就是说,和谐世界观密切关系到中国为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权”所做的努力。与国内可以通过行使主权来保护自己排除外界干扰,推行自己所主张的治理方案和意识形态不同,国际关系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可能通过显而易见的权力来推广和扩张某种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于中国来说,在国际关系中需要表达我们自己的主张,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表明我们对世界秩序的设想,提出我们对世界历史、现状的解释,创建对世界未来进行展望的学理化成果——这些都是中国成为一个大国或强国的基本条件。如果中国放弃对自身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坚守,那么国际关系领域就更有可能成为霸权国家及其提供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一言堂。和谐世界观的提出虽然不是以反霸为出发点的,但它的提出本身就会产生反对霸权的效应。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终能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世界观、政治制度等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并获得广泛的认可,是其真理性的终极表现之一。在共产主义事业处于低谷的今天,关于和谐世界观的研究就显得更加有意义,这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理论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无独有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发表了加拿大著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的一篇文章——

(接上页) 谐世界观:从毛泽东到胡锦涛》,载《唯实》2009年第Z1期;孙中原:《对立和谐与整体兼容——论墨家的和谐世界观》,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11期;孙中原:《墨家和谐世界观的理论创新》,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另外还有著作或文集集中的论文,如,毛峰:《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五章第二节;漆思:《中国共识:中华复兴的和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五章第三节;朱达成:《倡导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观——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和创新》,载中共中央宣传部舆情信息局编《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56页;顿占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载马仲扬主编《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社2007版,第108—110页;梁本凡:《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世界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新成果》,载孙学玉主编《价值》(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7页;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六章第三节,等等。

《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① 在该文中，考克斯从中、西文明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的方法思考了世界秩序的不同模式，但他没有过多地涉及中国的世界秩序方案。他反复追问这样一些问题——“笔者希望能了解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当中的知识精英是如何思考世界秩序的变化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秩序的地位”的、“笔者想知道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知识精英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在人类面临如何“在相异中共处”“如何与自然共处”这两个重大问题的时候，他想知道“中国人民以及学界、政治界的领袖人物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原因”。考克斯还断定，“中国的世界视角现在可能处于突变状态。构成它的一些关键要素无疑将仍然来自中国的过去，正如欧洲遗风继续影响现今西方民族对世界历史和未来的看法”一样。

并非巧合的是，考克斯的这一连串发问，正是从世界观的角度提出的。他强调必须思考以下问题：人们如何“构建起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思考世界的不同方式和思维”——即世界观（他也称之为社会的“精神结构”或“观念结构”），有必要探索“不同文化和文明中的人们在构建世界观中的方式”——世界观的建构过程，需要研究“人们构建其世界观的基本观念”——基本特征或预设。不仅如此，考克斯还明确将不同的世界观与对世界秩序方案的思考联系起来——从其题目即可看出。^② 由此我们能够发现，本书将具有独特的世界秩序方案作为世界观的首要界定特征，是合乎逻辑的。除了这些，考克斯还提到对世界秩序的研究“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的理论或世界权力观”，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就是“思想帝国主义”；至于“西方的世界观”，在他看来，自启蒙运动之后，是一种“世界进步观”，并且“伴随着单向的历史观”，等等。从考克斯的这篇文章，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我们认为，本书有关和谐世界观、霸权世界观的研究，与考克斯对世界秩序的思考相契合；其次，我们希望，本书对和谐世界观的研究，能够部分回答他向中国人民、中国领

① 罗伯特·考克斯：《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110—115页。

② 在某一处地方，考克斯更明确地提到世界观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他写道：“要取得持久和平……必须共同努力在一个协商的世界秩序中对这些观念加以调和，这种协商的世界秩序要容纳不同的立场的人们所怀有的不同目标和不同愿望。”见《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第112页。

导层以及中国学者提出的那一连串疑问。然后,和谐世界观要想成为一种有效或有吸引力的世界秩序方案,其中一个要求是需要将和谐世界观从政治命题上升为理论命题,以实现和谐世界观的学理化。

而将和谐世界观从政治命题上升到学术命题,我们必须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和谐世界观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课题,值得学术界重视并为此投入精力进行研究。如果不承认和谐世界观具有学术价值,那么自然会退避到和谐世界观不过是“十足的外交辞令”的看法中,不会对它产生进行研究的兴趣。其次,要让和谐世界观摆脱政治命题的命运,就必须走出以西方学术评价标准为准绳的陷阱。西方的学术研究标准是从西方世界观衍生出来的,同样有它的研究预设。^①在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使用西方的学术评价标准无法说明中国的观念与事物的时候,如果我们还重蹈这一老路,则无异于削足适履、自缚手脚。^②最后,将和谐世界观作为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来研究,不仅要求突破西方世界观及其衍生出来的诸多“研究预设”,而且还是以此为前提和条件的。不突破霸权世界观的预设,我们无法想象和谐世界观能够成为一种学术命题,进而也无须对其进行研究;当不对其进行研究,和谐世界观包涵的独特世界秩序自然得不到开发,从而又陷入到和谐世界观不过是战略口号的恶性循环之中。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理由,我们都有义务推进和谐世界观的学理研究。祛除霸权世界观预设和反抗象征性权力的控制,彰显和谐世界观的生命力,虽然有赖于对既有理论研究成果展开抽象和逻辑上的论证,然而,仅此并不足以完全确证或否证一个理论或假设的有效性,^③

① 维特根斯坦的“激进视角主义”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经典代表,见本书第二章。

② 通过反思本身的理论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历史实践或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差距,西方学术界已经开始抛弃以往用从西方推演或衍生出来的假定来裁剪中国事实的做法,这一趋势无论在哲学和历史学界,还是在社会学或心理学界,或是在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都已经蔚为大观。

③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针对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只有能搜集到足够有效的证据,就可以确证一个理论命题之真伪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他的“证伪论”。波普尔认为,在确认一个理论命题的有效性时,我们是无法穷尽所有的经验材料的,“因为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如果我们寻找确证的话”。因此,波普尔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见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页)波普尔的观点在科学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又遭到其他人如拉卡托斯、费耶尔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与修正。见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尤见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因为理论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和生活世界问题，理论的效力只有在生活世界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因此，和谐世界观能否满足中国人对本体安全和承认安全的需要，最终必须回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上来。我们坚信，只有中国学者愿意对自己的生活世界进行肯定，进而对和谐世界观进行自我赋权，和谐世界观的提出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和谐世界的建立也是可行和可欲的。

为了推进和谐世界观的学理化水平，我们首先需要将“中国到底为什么要提出和谐世界观”作为学理化的问题来研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和谐世界观纳入到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讨论和谐世界观提出的意义。在国际关系中，与在国内社会中一样，同样是存在等级的，这种等级首先反映在国家所拥有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上。依据实力大小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可以被划分为超级大国、强国、中等大国、小国等不同的等级。这种等级制，还反映在国家所信仰或拥有的世界观上，如国际关系中既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观，还有许多居于弱势地位的世界观（weaker worldviews）。考虑到国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观，能对居于弱势地位的世界观形成压制效应，我们可以将那种居于主导地位的世界观称之为“霸权世界观（hegemonic worldviews）”。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等现象的研究不同，霸权世界观虽然是以经济与军事实力为基础，但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而且其作用对象往往是处于或接受弱势世界观人们的心智结构和思想意识，而不是人们像提及的帝国主义那样以威胁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家生存为主要目标。就此而言，霸权世界观与人们经常提及的“文化帝国主义”有很多相似性。^①事实上，霸权世界观的性质、作用方式、政治效应等还与意识形态类似。

^① 国内外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在此无法一一罗列。以此为题或密切相关的专著请参考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有关“霸权世界观”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本书不做专门研究，不过，本书第一章将会从“文化”与“世界观”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而第五章也涉及文化和世界观及国家安全的不同层面。

因此,在研究霸权世界观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从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的,是居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拥有的意识形态。他们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①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内意识形态后果的上述说明相似,国际社会中国霸权世界观同样是一种控制弱势国家的思想力量。^②与国内意识形态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都拥有主权,霸权国家向别国灌输或传播意识形态的企图往往会遭到强烈的抵制,以致不被其他国家自愿接受,因此,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种不被其他国家意识到的“霸权意识形态”。而霸权世界观则不同,通过将自身隐藏在知识、制度运作等活动中,霸权世界观能够有效地被本来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们接受,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甚至塑造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想象。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世界观,既可以由霸权国家单独拥有,也可以与那些信仰同一世界观的其他国家一起分享。对于前一种情况的行为主体,我们可以直接称之为霸权国家;对于后一种情况,则可以称之为“霸权世界观国家集团”。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国,构成霸权世界观的是现代西方世界观,它为西方主要大国所共有,因此“霸权世界观国家集团”也就是西方主要的资本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当然,现代西方世界观上升为霸权世界观经历了极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霸权世界观国家集团”的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② 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一种霸权世界观的观点也可参考 J. Marshall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Indigeneity, Cosmology,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主观推动,还有信仰其他世界观的人们对现代西方世界观的主动学习和自愿接受。总体而言,在殖民主义时代,前一种途径居于主导地位;二战以来的时期,现代西方世界观因为其“科学性”的面貌以及西方国家在科技、政治、经济各领域中的强势地位,以一种吸引力的方式吸引第三世界的人们主动接受。尽管在后一过程中西方国家同样作出了很多努力,但他们已不敢明目张胆地推行现代西方世界观。此外,将霸权世界观视为西方国家共享,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在世界观问题的具体立场完全一致,更不是说这些国家目前仍在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向非西方国家灌输现代西方世界观。事实上,西方国家在具体的世界观——包括对“世界观”概念的认识、世界观的内涵与外延、具体的世界观等——上是有许多不同意见的;而且,在推广现代西方世界观这一问题上,西方国家无疑也有不同的态度——如在明确希望利用西方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worldview 问题上,同为西方国家的超级大国美国与蕞尔小国瑞士就不可能有同样的立场。因此,本书之所以将现代西方世界观视为一种霸权世界观,是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首先是出于分析上的方便;其次是有助于比较准确地概括现代西方世界观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地位;最后还有助于理解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有意无意地强调在对外关系推行价值观外交的深层根源。

当国际关系中存在一种霸权世界观时,和谐世界观的提出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既然和谐世界观内在地包含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方案,那么,它的提出,本身就能产生反抗或抵制霸权世界观的客观后果与政治效应。^①自然本书的研究主题,就在于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在国内社会中政治作用的分析扩展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通过将霸权世界观与和谐世界观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中,揭露霸权世界观带来的政治与理论后果,从而为人们考察和谐世界观提出的意义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我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提出和谐世界观,部分原因就在于反抗霸权世界观对我们想

① 计秋枫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角度讨论了“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意义。见计秋枫《中国外交反对霸权主义的路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6期,第38—45页。不过计文一方面没有将“和谐世界”理念视为一种世界观,另一方面只是强调了“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道德方面的含义,这是本书与计文的不同之处。

象世界可能性的控制,从而为世人提供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但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秩序方案。也就是说,本书的研究起源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我们在世界观与国际关系,尤其是在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框架中考察和谐世界观时,我们需要追问,中国为什么要提出和谐世界观?

这样一来,探讨中国为什么要提出和谐世界观,就构成了本书的问题意识。要明确本书的理论与思想脉络,我们还必须对“问题意识”的概念做必要交代,这主要是便于研究者和阅读者把握问题所提出三个方面的背景,即时间、空间与文化背景。用著名文化研究者张旭东的话来说,所谓问题意识,“说穿了就是在学术思想的时代脉络中为时代性问题作好准备,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时代性框架中为学术思想问题作好准备”。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学术研究中,“找自己现实问题与学术问题的交叉点,找自己当代问题和古代问题的连续性,找‘国学’和‘西学’相通的地方”。^①概括起来,问题意识就是去寻找那些能够有效衔接古、今、中、西^②、理论与实践六个方面、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中国语境下,这里的问题,自然是指“从中国立场出发”的。问题意识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如果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的引导,无论研究者本人还是阅读者,都将无法清晰识别问题所处的思想脉络或问题脉络,也就无法定位研究的意义和所做的贡献。^③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不仅需要研究设计所体现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精神、理论旨趣与实践关怀有所意识,而且还要求学者们在与“他者”(他者文化、他者世界观、他者的研究成果等)进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反思所提问题的价值;如果可能,还要使这种从自我出发、回归自我、最初具有特殊性关怀的研究,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成果。相较于西方社会科学中用以衡量学术命题或研究设计是

① 上述引文都出自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363页。

② 移居香港的学者甘阳,曾经就中国学术界争论不休、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古”“今”“中”“西”四个方面的问题给中国学术界带来的诸多困惑做过专门的论述。请参考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③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否具有价值的标准,^① 张旭东关于问题意识的观点更为激进,也更为坦诚,因为他不像大多数西方学者所鼓吹或所主张的那样,认为学术研究是一项价值中立的事业,^② 而是指出学术研究与研究者所在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他指出:

不是说价值中立的学术才是纯学术,历史上哪有过什么价值中立或纯学术? 分析所谓价值中立的学术,就是要分析它怎么来的,基于怎么样一种特殊的生活世界。对这套有特定的、相对隐蔽的价值取向的学术和叙事,我们要有能力看到他们所属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

① 根据一本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教科书的看法,用以评估和指导人们进行从事研究设计的主要学术标准有两个: 1. 研究的问题对于理解现实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设计应提供关于世界某些方面可检验的假设,为特定研究领域提供知识增量。见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该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提倡新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认为这是唯一可靠和有效的研究方法、推崇因果分析模式、强调研究时的价值中立,因此,它遭到了来自后实证主义、文化诠释论、后结构主义等流派的尖锐批判。对该书观点进行的最新评价或批判可参考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3 页注 9 所列的参考书目;也可参阅 Richard Ned Lebow and Mark Irvinb Lichbach, *Theory and Evidence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尤见该书第 4—5 页。张旭东关于“问题意识”所作的阐述,与此有显著不同。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 前者强调行为体的文化背景,而后者仅仅强调提出的问题能够增加知识存量和问题具有重要性。我认为,问题重要与否的判断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文化背景,对于一种文化或世界观而言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也许对于其他文化或世界观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将多次看到这样的实例。

② 这种关于学术研究是可以而且要求保持价值中立的观点,经常被追溯到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见(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 I: 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该书往往是西方学者勉励自己从事所谓“价值中立”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中国学者王逸舟,也以韦伯的“以科学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存在的问题。他据此认为:“我们多数人的‘学术努力’,仍然不太像一种探索性的事业,仍然与‘以科学为业’的要求有相当距离。”见王逸舟《试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步”: 几点批评与思考》,载《外交评论》2006 年第 3 期,第 35 页。不可否认,王逸舟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批评是比较公正的,然而,“我们要注意,韦伯本人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仅仅恪守学术天职的职业化‘专家’;他并不是当今学院专业人士的老祖宗,因为激励他、困扰他的最终是一个价值问题”,这个价值问题就是“德国要做什么样的国家;德国人要做什么样的国民;德意志民族在世界竞争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它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的抱负”。(见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1 页)。